

評王奇生著《黨員、黨權與黨爭—  
1924-1949年中國國民黨的組織型態》  
上海：上海書店出版社，2003年10月。377頁。

楊維真\*

一

長期以來，中國大陸學界由於受到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框架侷限，在政治力量影響下，其歷史著作有淪為「黨八股」之趨勢；甚至文革期間乃有所謂「以論代史」的現象，歷史著作的真實性與獨立性大受考驗。1980年代以降，大陸政局撥亂反正，學界亦力圖振作，其史學作品漸有改觀。自1990年代以迄世紀之交，大陸歷史學界懲前之失，新一代學者逐漸形成兩股新趨勢：一為吸納西方史學新理論，尤以後現代主義及新文化史為圭臬，並普遍運用於思想、文化、遊憩、身體、符號、醫療、情慾及女性主義等議題的探討上；一為回歸史料學派之傳統，梳理大量一手史料，強調歷史研究係依證據說話，意欲透過堅實的史料基礎，以重建真實的歷史。就其研究成績而言，二者俱為可觀。然前者因非本文重點，茲略而不論；後者則尤以在政治史研究領域中，刻正引領風騷，諸如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楊天石、華東師範大學的楊奎松、南京大學的陳謙平、陳紅民等人的著作史料證據之堅實，即令人印象深刻。王奇生近著《黨員、黨權與黨爭—1924-1949年中國國民黨的組織型態》一書，當亦屬於此一類之作品。

本書作者早年係研究留學教育，曾任職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及華中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，後轉向中國國民黨史研究，並以〈國民黨基層權力群

---

\* 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系副教授

體研究：以 1927-1949 年長江流域省份為中心〉為題，獲華中師大歷史研究所博士學位。旋至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從事博士後研究，並完成博士後研究報告〈中國國民黨的組織型態和運行機制（1924-1949）〉；現任職中國社科院近史所研究員、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。本書係以作者博士後研究報告為基礎修訂而成，由於資料詳實、觀點新穎，頗能突破前人窠臼，自出版後甚受學界重視，短短一年內僅臺灣學界即已有兩篇書評，其引發廣大之回響足見一斑。<sup>1</sup>

## 二

自 1894 年孫中山於檀香山創立興中會始，中國國民黨迄今已跨過三個世紀。其間國民黨先是執掌中國全國政權二十餘年（1927-1949），1949 年兵敗來臺後，復繼續統治臺灣半個世紀；其興衰既引人興趣，且與中國現代歷史的關係實密不可分，是以歷來學界對國民黨史的研究頗不乏人。惟過去研究之成果，自早期鄒魯《中國國民黨史稿》<sup>2</sup>以迄近期李雲漢《中國國民黨史述》<sup>3</sup>，乃至素以研究「國民黨統治下中國」著稱的美國學者易勞逸（Lloyd E. Eastman）《流產的革命》（*The Abortive Revolution: China under Nationalist Rule, 1927-1937*）、《毀滅的種子》（*Seeds of Destruction: Nationalist China in War and Revolution, 1937-1949*）諸書，<sup>4</sup>類多偏重國民黨統

<sup>1</sup> 此兩篇書評分見《近代中國》第 157 期（蘇瑞鏘文）（臺北：中正文教基金會，民國 93 年 6 月）及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》第 44 期（李里峰文）（臺北：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，民國 93 年 6 月）。

<sup>2</sup> 鄒魯：《中國國民黨史稿》（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民國 54 年，臺一版）。

<sup>3</sup> 李雲漢：《中國國民黨史述》（臺北：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，民國 83 年）。

<sup>4</sup> Lloyd E. Eastman, *The Abortive Revolution: China under Nationalist Rule, 1927-1937* (Cambridge: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, 1974); *Seeds of Destruction: Nationalist China in War and Revolution, 1937-1949* (Stanford: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, 1984). 易勞逸專研國民黨史，此二部專論為日後學者提供新的研究方向，對西方「國民黨學」的開創居功厥偉。

治時期各項施政得失及外在環境的探討，此即作者所謂「黨治史」的角度。至於國民黨的內在結構，諸如組織架構、黨員成分、階級基礎、黨政關係、錄用體制、派系鬥爭等，亦即作者所稱「治黨史」之內容，則率多不詳。緣此，作者乃以「治黨史」的角度寫作本書，著重考察國民黨的內在結構，呈現與前人不同的視角，這是本書較特殊的地方。

本書共分十四章，每章雖均以專題形式進行論述，但各章之間大抵依時序排列；除第十四章〈結論〉外，全書按時間先後順序可分為四個階段。第一章至第三章為第一階段，時間約為 1924 年國民黨改組以迄 1927 年清黨，探討重點則為國民黨組織在此階段的變化。第一章〈改組：俄共體制的引入與變異〉，說明孫中山如何引入俄共體制改組國民黨，從而使國民黨組織產生革命性變化，成為具有群眾基礎的現代動員型政黨；作者同時亦指出，孫的改組絕非全盤俄化，而係以「三民主義為體，俄共組織為用」，主從關係清楚明顯。第二章〈改組後黨員的社會構成與基層組織〉，作者認為改組後國民黨員主要是由中小知識分子，尤其是青年學生所構成，此與中共當時情形相同。然而值得注意的是，國民黨改組後雖進行黨務組織的重大調整，但與列寧式政黨有所不同，其基層組織相當薄弱，呈現「重上層，輕下層」的現象；由於缺乏經費與人才，地方黨部（鄉村尤然）多為土豪劣紳所把持。第三章〈從「容共」到「容國」〉，作者指出，此一階段國共關係有其兩重性：中共黨員以個人身分加入國民黨，形成「黨內合作」關係；但同時中共仍於國民黨之外獨立存在，故兩黨關係又是一種「黨外合作」關係。是以就國民黨角度言，乃既「容共」又「聯共」。其後在中共強勢話語影響下，逐漸控制國民黨意識形態及宣傳，遂使國民黨青年黨員大量左傾，甚至有改宗轉黨現象，而有所謂的「容國」（共產黨容納國民黨）。作者認為此主客易位之因與孫中山以「三民主義為體，俄共組織為用」的治黨策略緊密相關，因其以俄為師只學了半套，當然不及全盤俄化的中共如此組織緊密，雙方交手，勝負立判。

第四章至第十章為第二階段，時間由 1927 年清黨以迄 1937 年抗戰爆

發，探討重點則為「南京十年」國民黨的組織結構，此部分篇幅占全書之半，比例相當吃重。第四章〈蛻變：革命黨向執政黨轉型〉，作者指出，清黨對國民黨造成人才的逆淘汰，最具革命理想與熱情的左派年輕黨員若非遭受捕殺清洗，即因對革命失望而脫離；反而是大批投機分子及土豪劣紳湧入國民黨內，革命精神消逝殆盡。同時，國民黨執掌全國政權後，開始禁止民眾運動，黨與工農群眾割裂的後果是，國民黨由一具有廣泛群眾基礎的革命黨，轉變為以官僚政客為主體的執政黨。第五章〈工人、資本家與國民黨〉，作者以上海三友實業社勞資糾紛為個案探討，說明聲稱代表全民利益的國民黨，在面對上海勞資兩大陣營的正面交鋒時，實深感左支右絀，藉以道出國民黨社會基礎之薄弱。第六章〈黨治結構：法理型態與實際型態〉，作者指出，國民黨執政初期，黨人「黨天下」意識普遍濃厚；在法理上黨權高於一切，但實際上黨權日降，大權有向軍政傾斜的趨勢。國民黨歷經執政初期黨權與軍權的角力，及至 1931 年後軍權終於控扼黨政，蔣介石從此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。蔣以武力支撐黨，國民黨在結構上仿俄共一黨專政政體，而其內涵則融入蔣的軍治理念，是國民黨一黨專政與蔣介石軍事獨裁相結合之體制。第七章〈黨政關係：黨治在地方層級的運作〉，作者論及國民黨執政後，開啟黨政雙軌制，表面上雖厲行黨治，中央甚至實施以黨治政，但在地方層級則是黨政分治，地方黨部不能干預地方行政。由於地方黨權低落，黨無法指揮政，國民黨「黨治」在地方層級近似一種虛擬狀態。第八章〈政治錄用：黨員對政治資源的控制程度〉，作者透過政治錄用—即「入仕」機制分析國民黨的「黨治」性質，說明黨員雖有優先入仕的權力，但黨籍並非絕對條件，以證明「黨治」其實是「黨義治國」而非「黨員治國」；從而指出國民黨實乃一弱勢獨裁政黨，並不具備實施高度黨治的力量。第九章〈黨的派系化與派系的黨化〉，作者以「黨的派系化」（CC 系）及「派系的黨化」（CC 系、力行社）分析國民黨內的派系之爭，說明 CC 系、力行社等黨內派系雖以擁蔣為宗旨，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撐蔣介石早期的成功，但派系惡鬥及內耗亦導致蔣與國民黨最後的崩潰。第十

章〈戰前黨員群體分析〉，作者指出，國民黨執政後，軍人黨員急速膨脹，象徵戰前國民黨組織軍事化傾向，此與蔣介石「軍隊黨化」及「黨軍隊化」的構想有關。由於地方黨組織軟弱渙散，加以黨與民眾疏離，除軍人外，戰前國民黨吸收普通黨員的速度不僅緩慢，分布地域相當有限，數量也非常微小，其組織基礎十分脆弱。而普通黨員群體的社會構成，主要集中於知識界及政界，且政界有增高的趨勢，遂使國民黨黨員漸趨官僚化，這對於自稱為全民政黨的國民黨，在理念上無疑是一大背離。凡此種種，皆使國民黨員的社會形象江河日下。

第十一、十二章為第三階段，主要處理抗戰時期（1937-1945）國民黨組織體制的調整。第十一章〈黨政團：戰時體制的調整〉，作者指出，抗戰爆發後蔣介石為挽救國民黨組織危機，乃於國民黨外組建三民主義青年團，原冀望三青團能有助戰時國民黨的改造與新生，但黨團之間為爭奪政治資源，勢成水火，反促長黨內派系傾軋，進一步加速國民黨的分裂及潰敗。同時在戰時體制下，不論是中央的「以黨統政」，省市的「黨政聯繫」，抑或是縣的「黨政融合」，實際上軍政首長（尤其軍事首領）掌握大多數權力，黨部淪為附庸，黨權更為低落。第十二章〈戰爭泥淖中的黨機器〉，作者指出，經過抗戰初期黨員的大批流失，國民黨於1939年起開始大量吸收新黨員，同時地方黨部組織亦大為強化，除省、縣外，並能深入鄉鎮，與基層民眾有了直接接觸。但由於黨員入黨幾乎是不加甄別，其素質良莠不齊。戰時黨員分布區域主要集中於國民政府控制區，與戰前相比，黨員出身知識界比例降低，出身政界比例急劇竄升，整體教育水準明顯下降；尤其是內地省區原有保守勢力、政客官僚大批入黨，黨員腐化劣化日趨嚴重，國民黨組織表面膨脹，但實則更趨衰頹渙散。

第十三章〈「六大」前後的派系政治與精英衝突〉為第四階段，探討抗戰勝利前後（1945-1949）國民黨的派系鬥爭與人事傾軋。作者論述1945年6月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期間，黨內激烈的派系交鋒，從而說明派系鬥爭實乃國民黨揮之不去的夢魘。在此前後，雖有部分國民黨員不滿黨的腐敗，為尋求振衰自救之策，乃發起一場「黨政革新運動」；但一

則革新運動未觸及到「黨治」核心問題，二則革新分子多為 CC 中人，難免不使人引發派系聯想。緣此，革新運動在轟轟烈烈一陣子後，乃告無疾而終，國民黨自救行動失敗，「亡黨亡國」危機迫在眉睫。最後，作者在結論〈弱勢獨裁政黨的歷史命運〉中指出，由於國民黨結構性的諸般缺陷，使其無法深入、整合社會底層，1924 年至 1949 年的國民黨始終是一「弱勢獨裁政黨」。正因其結構性的組織缺失，在與中共的鬥爭中，不待 1949 年的軍事大潰敗，實際上國民黨已「先天下之亡而亡」。

### 三

本書徵引書目之豐富，就書末所列各項文獻資料，合計高達 318 種之多，不僅彰顯作者勤於蒐集、爬梳資料，亦形成本書重要的特色。過去大陸學者在撰寫史書過程中，多未能參閱臺灣及海外地區重要資料及研究成果，作者於此則有很大的改善。甚至某些史料，譬如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的《王子壯日記》，<sup>5</sup>乃為作者論證史實之重要依據。《王子壯日記》係中研院近史所近年出版重要日記之一，由於出版未及 4 年（2001 年出版），加以王子壯其人僅國民黨內一中高級黨務人員，此《日記》重要性遂為人所忽視，學界引用者尚不多見。實則王子壯可謂國民黨忠貞黨員，且自基層始，歷任中央黨部各機構，1948 年 8 月 4 日因心臟病病逝南京；蔣中正重要幕僚、長期擔任侍從室第二處主任的陳布雷在聽聞王氏惡耗後，痛感「斯人不壽，悼歎何任！」唁喪時復知「臨歿家境蕭條」，以「如此忠良，一棺黃土，悼痛何極！余（陳氏）於十六年服務中央秘書處時，即欽其為人，今不可再晤言矣。」<sup>6</sup>足見陳布雷對其痛惜之深。王子壯由於久歷黨職，眼見國民黨由盛而衰，其日記中頗有敘痛之反省。如論及陳果

<sup>5</sup> 王子壯：《王子壯日記》（臺北：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，民國 90 年）。

<sup>6</sup> 陳布雷：《陳布雷先生從政日記稿樣》，民國 37 年 8 月 4 日、6 日記事，頁 1012。《專藏檔案》，國史館藏，檔號：0161.40/7540.01。

夫、陳立夫兄弟時稱，「二位陳先生以往十餘年之政績如何，故人所共知，其理論不足以號召黨人，其態度則不免於褊狹，其最優之點不過忠實努力，能為蔣先生造成黨內之一系幹部而已。由今日環境以觀，蔣先生既為全國之公認領袖，宜在理論的統率，統一的教導，此正二陳之最不擅長者。」（頁 324）再如 1945 年 6 月，國民黨召開六大，引發黨內更劇烈的紛爭，王氏對黨的前途憂心忡忡，謂「此次代表大會開會以後，極見人心之渙散，領袖之尊嚴為之減低不少，黨內之分歧必形成力之分散，國民大會後，黨將成分裂之局，更如何能克制共黨，挾全黨之力難以制勝者，況復自己之分化。此為黨內最危險之現狀，不知總裁將如何挽救此危險局面也。」（頁 332）作者於此大量引用國民黨忠貞黨員對黨的批評檢討，不僅加強本書論證之力道，亦較能呈現史實的客觀與真實。惟作者因受大陸人士來臺之限制，無法直接參閱臺灣所藏國民黨及蔣介石相關檔案資料（如國史館藏《蔣中正總統檔案》），這是有待日後補強的。

此外，作者亦善於綜合過去研究成果與資料，經鎔鑄消化後，成為有系統的新知識。譬如作者在第一、二章論述國民黨改組前後黨員的社會構成時，明顯受到呂芳上及羅志田著作的影響，呂芳上論證民初中學生為謀求出路而引發學潮，<sup>7</sup>羅志田說明傳統四民社會的解體，<sup>8</sup>皆由作者創造性轉換為對國共兩黨黨員的結構分析，指出知識青年踴躍投身國共兩黨，實與追求個人出路的政治參與壓力密切相關（頁 28-38）。在第六章論及國民黨內「黨權」與「軍權」的角力時，蔣永敬以「軍權」、「黨權」、「民權」的較量分析國民黨實施訓政的理論架構應對其有相當影響；<sup>9</sup>惟作者由此聯繫到蔣介石的重軍輕黨以及社會軍事化，則是蔣永敬文中未曾觸及的（頁

<sup>7</sup> 呂芳上：《從學生運動到運動學生》（臺北：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，民國 83 年），特別是第二章第二節，頁 65-74。

<sup>8</sup> 羅志田：《權勢轉移：近代中國的思想、社會與學術》（武漢：湖北人民出版社，1999 年）。

<sup>9</sup> 蔣永敬：〈國民黨實施訓政的背景與挫折—軍權、黨權、民權的較量〉，氏著：《百年老店國民黨滄桑史》（臺北：傳記文學出版社，民國 82 年），頁 165-198。

167-179)。

在論證方面，作者亦頗有其獨立之見解。如在論及國民黨改組時，作者反駁呂芳上所持「國民黨改組工作於鮑羅廷來華前已積極進行」之說，認為呂係將性質不同的「改進」與「改組」混為一談（頁9）。而在論及「容共」與「聯共」之爭時，作者一反大陸學界之主流意見，坦言「孫中山當時的意識中，並不認為國共關係是一種黨際之間的『合作』關係」（頁50），「所謂兩黨『合作』，在最初兩年多的時間裡，只是共產國際和中共單方面的提法。」（頁51）作者認為兩黨關係是一由「容共」逐步轉向「聯共」的過程，其中樞紐尤其在於「中山艦事件」後，1926年5月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通過〈整理黨務案〉，國共雙方共同組成「聯席會議」，正式承認兩黨合作關係，是為國民黨「聯共」之始（頁55-59）。這些都是很有見地的看法。

第五章論述三友實業社勞資風潮是本書十分精采的部分，作者不僅突破大陸書籍向來多認為「國民黨為維護資本家階級利益而限制工人運動」的主流看法，實事求是地爬梳整理檔案資料，並從「三友案」國民黨中央民眾運動指導委員會壓抑、痛斥、譴責資本家階級得出一重要結論，即「國民黨主要非維護某特定階級利益，而係維護其統治秩序」（頁145）。同時作者亦反駁西方學者所稱「上海資本家在南京政府壓力下根本無力反抗」之說，認為此次「三友案」上海資方大團結，甚至用孫中山遺教對抗國民黨中央，逼使國民黨不得不以修改〈勞資爭議處理法〉以對付資方的頑抗，提供了鮮明的反證，這些觀點都值得學界注意（頁146）。

不過，本書亦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問題。在體例方面，一般史著多採史遷「詳近略遠」之原則，然而作者於此則大有可待斟酌之處。本書主要論述1924年至1949年間國民黨組織結構的變遷，但就篇幅而言，第一階段（1924-1927）三年有三章，占全書四分之一弱；第二階段（1927-1937）十年有七章，占全書之半；第三階段（1937-1945）八年僅有兩章，占全書七分之一；第四階段（1945-1949）四年更只有一章，僅占全書十四分之一，



其頭重腳輕、比例失衡自不待言。尤有甚者，作者將全書重心置於戰前階段，而影響中國及國民黨最劇烈的戰時及戰後時期僅占全書四分之一弱，以如此薄弱之篇幅，欲論證國民黨於 1949 年軍事大潰敗之前，已「先天下之亡而亡」，實難令人信服。究其實，抗戰對國民黨衝擊之大，即連向來對國府持批判態度的易勞逸亦承認，忽略國民黨在戰時面對強敵的困難對其是不公平的。<sup>10</sup>易氏因此撰寫《毀滅的種子》一書，以詳論國民黨戰時及戰後的歲月，作者其有志乎？

在觀點方面，作者一再強調一黨獨裁之政權亦有強弱之分，而國民黨則是「弱勢獨裁政黨」(頁 200)，吾人不禁要問作者區分強弱的準據何在？實則就政治學而言，所謂強勢獨裁即為「極權政治」，而弱勢獨裁則為「威權政治」；二者的區別在於：1. 權力使用目的不同：極權政治不僅集中一切政治權力，並將社會一切活動均政治化，控制人民一切言論、思想、態度、行為，達成全面集體化社會；而威權政治則是將權力集於一身以控制人民，但對人民非政治性生活則不加控制。2. 極權政治有「烏托邦」成分，而威權政治則有「保守性」：極權統治者通常一再強調實現其意識形態中的理想境界，並以不斷的「運動」來維持其政權；而威權政治目的只在維持政權，故政策保守，以穩定維持政權。<sup>11</sup>由此可知俄共、中共當屬極權政治，而國民黨則為威權政治，二者仍有相當差異。作者若能稍涉獵政治學，當能清楚剖析國民黨的性質，而不致陷入強弱字眼之爭議了。

作者在本書章節中對國民黨階級基礎問題著墨甚多，並對國民黨聲稱代表全民利益提出質疑，因國民黨員的社會構成主要來自於知識界及政界，工農黨員微乎其微，顯然不符「全民」之稱(頁 262-263)。但事實上，所謂「全民政黨」應非指黨員成分，而係指施政目的為顧及全民利益；國民黨既號稱「全民政黨」，其施政自不可能獨厚某一特定階級。加以孫中山

<sup>10</sup> Lloyd E. Eastman, *Seeds of Destruction: Nationalist China in War and Revolution, 1937-1949*, pp.221-222.

<sup>11</sup> 彭懷恩：《政治學》(臺北：風雲論壇出版社，民國 82 年)，頁 96-97。

晚年社會主義之傾向多少影響國民黨人，國民黨中央在「三友案」所流露濃厚的反商情結顯然其來有自，因此國民黨階級基礎問題恐較作者所論更為複雜。

作者既自稱係從社會史角度切入，將國民黨史置於更為廣闊的社會歷史變遷背景中來描述（自序，頁2），則某些字眼的定義宜更為清楚。譬如作者在第二章、第四章、十二章皆提及土豪劣紳滲入國民黨基層組織，使黨部更趨腐敗（頁44-45，100-102，298-299），然則何謂「土豪劣紳」？其標準何在？事實上，「土豪劣紳」一辭係流行於北伐時期的兩湖農運，運動高峰時甚至有「有土皆豪，無紳不劣」之說。作為政治宣傳，「土豪劣紳」一辭當然可用；但如為學術著作，是否應更為嚴謹，至少就社會史的角度分析所謂「土豪劣紳」的社會構成與成分，不知作者以為然否？

國民黨於1924年改組，1925年組建國民政府，1926年北伐，1928年統一全國，其成功之速在歷史上亦為少見。但由於成功過速，黨員養成不及，何能在奪取全國政權後立即承擔執政責任？加以黨員入黨黨齡尚淺，其對主義認知究竟如何尚屬疑問。如陳布雷即曾在其回憶錄中言及：

（1929年春）參加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，被選為中央候補監察委員。事先，余曾提議「凡入黨不滿三年者概不得當選中央委員」，以絕倖競之風，而保持黨的純粹性，然主席團恐引起爭議，未予提出。及選舉揭曉，又復上書胡、譚諸公及蔣總司令力辭，然以黨中向例，既被選出，不得請辭，卒未獲許可。余以主張不遂，且深憂黨中此後將以爭競地位而多事，故對於當選，滋以為戚焉。<sup>12</sup>

陳布雷的憂心絕非過慮，譬如孫中山雖強調訓政，但其進行步驟係由下而上，且時間定為六年，六年之後即進入憲政階段；故就中山遺教及國民黨黨義言，實無國民黨永久專政之可能。無乃部分黨人「黨天下」氣焰高張，不僅倡言「黨外無黨」，意圖壟斷政權，更爭相競逐高位，日後國民

<sup>12</sup> 陳布雷：《陳布雷回憶錄》（臺北：傳記文學出版社，民國65年），頁75-76。

黨的派系紛擾有一大部分即種因於此。「亡黨者，黨人也」，應是此最好的說明。

#### 四

2003年11月，筆者於臺北召開的「一九四〇年代中國軍事史國際學術研討會」上，即曾親聞本書作者談及其對國共戰爭之看法，認為國共鬥爭已是吾人祖父一輩的往事了，現今學者應儘可能屏除政治恩怨及黨派私見，客觀地就史料論述國共關係歷史。旨哉斯言！通觀本書，雖亦有若干不足之處，但基本上作者確已做到前述所言，儘量擺脫政治恩怨，較客觀地爬梳史料以論述歷史，提出對國民黨史更深刻的觀察，這些用心是深值肯定的。